

## 在双重反思中批判、解构与重建 — 解读华人作家李彦的《红浮萍》

毕文秀\*

### 【目 录】

1. 引言
2. 对母亲人生悲剧的反思与批判
3. 解构与重建中国形象
4. 结语

### 【摘要】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华人作家创作的命名及范畴界定还没有达成共识,大体围绕着“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华人文学”而展开,这主要是因为各学者的学术立场及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引起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华人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以及华人作家作品研究的意义。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决定了中国当代作家对现实的极大兴趣,而在处理革命历史资源时,他们的主题总是跳不出对于历史是非的判断,纠缠于现实生活的恩怨,对苦难的书写也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主题展开的。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中国当代文学能否摆脱这一困境,华人作家的文学创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华人作家李彦的中文版小说《红浮萍》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及精神分析、文化分析等方法论,探析小说的思想层面,分析李彦如何反思故国历史,作为一个生活在北美多年的知识分子,她对西方文化又有着怎样的思考,李彦的这种双重视域下的反思,充满了批判、解构与重建意识,试分析其对华人写作的意义。

【关键词】反思意识; 中国想象; 批判意识; 解构西方中心主义; 重建中国形象; 文化认同。

\* 부산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강사 (wenxiu79@hanmail.net)

## 1. 引言

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从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再到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更是展开了各种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作为反映一个时代人生活的载体，这些自然是中国当代作家及华人作家笔下经常出现时代背景。而大多数作家在涉及到这段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中的各种政治事件时，展现的多是其残暴的部分，描写人性的阴暗面，批判的背后有一种控诉意识作祟。学者贺绍俊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将其归结为“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他认为“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深受西方近现代文化影响，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通过翻译和介绍，将西方的思维方式、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注入到白话文中，奠定了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

“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决定了中国当代作家对现实的极大兴趣，而在处理革命历史资源时，他们的主题总是跳不出对于历史是非的判断，纠缠于现实生活的恩怨，对苦难的书写也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主题展开的。”<sup>1)</sup>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中国当代文学能否摆脱这一困境，华人作家的文学创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并不是说华人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关于华人文学同中国文学间的关系，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中国大陆学者提出“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把华人文学（主要是华人华文文学）归入“世界华文文学”这一范畴，实际上华人文学同中国文学的关系是附属关系，甚至“世界华文文学”中中国文学是缺席的。美籍华裔学者史书美教授在“反离散”的基础上提出“Sinophone Literature”，主张把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批判“中国中心主义”与“在地中心主义”。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可以说是“Sinophone Literature”的积极推广者，他先是把“Sinophone Literature”翻译为“华语语系文学”，但鉴于“sinophone”是“华夏的声音”这一意义，而“华语语系文学”其性质并不同于“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及“西语语系文学”中具有的后殖民性质，王德威在其论文《华夷之变：华语语系研究的新视界》(2018)中明确指出他将以“华夷风”来对这一领域进行命名。<sup>2)</sup>对“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范畴的界定，史书美和王德威的意见并不相同。史书美认为“华语语系文学”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以及散在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文文学和中国大陆内部少数种族文学，主张将中国文学排除在“华语语系文学”之外。王德威则主张将中国文学“包括在外”。在王德威看来，“Sinophone Literature”不仅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以及散在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文文学，还包括大陆内部各地区声音的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和大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华人非华文作品也应包括在内。韩国学者金惠俊教授认为华人及华人社群同中国并不是附属关系，是独立存在的，超越了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界限，是新兴跨国移居者的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华人文学”包括“华人华文文学”与“华人非华文文学”，其内涵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和华人的层面，是全人类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sup>3)</sup>各学者的学术立场不同，

1) 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文艺研究》，2011年第2期，p. 19。

2) 王德威，〈华夷之变：华语语系研究的新视界〉，《中国现代文学》，第34期，2018. 12。

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华人作家的文学创作及研究的重要性。

从华人作家的写作资源来看，大部分华人作家的写作资源依然是“中国经验”，可能正因为是以“中国经验”为主，引来了他们创作归类范畴上的争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再加上互联网等高科技的发达、交通便利等等原因，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移民潮。多数移民可以自由往返于来源国和所居国之间，甚至移民后的再移民现象也屡见不鲜。因此，我曾经受王德威教授的启发，在他提出的“三民意识”基础上提出了移民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他们的思维中有一种“后移民时代的三民意识”特征。<sup>4)</sup>“三民意识”是指移民同时具有移民意识、遗民意识和夷民意识。“移”注重其移动的意义，“遗”因为故国经验转换为潜意识而使得他们具有了从政治身份转化为情感上的“遗民意识”，“夷”是一种既相对于移居国又相对于来源国而言的双重“夷民意识”，这里的“夷”毫无贬义，取“他者”之意。也就是说当今时代的移民，其身份是复合型的，不单单是移民，同时还是遗民和夷民，这样他们就具有了融这三种意识为一体的心理特征。当然这三种意识，会因时因地，要么是其中的一种起作用，要么是三种意识同时起作用。因此他们“笔下的中国经验就不是单纯的中国经验、单纯的中国式写作，也不是单纯的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延伸、延续，而是独立自在的，同时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up>5)</sup>应该说这只能说明华人作家“中国经验”写作的内在情感因素，在此我还想补充一下外在的社会因素。华人移民以后，尤其是选择北美作为移居地的华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过着华人聚居的生活。而亚裔（包括来源国是中国）在美国素有“模范少数族裔”之称。美籍华人社会学者周敏在分析美国华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模范少数族裔”且实现上向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同华人“聚居区族裔经济”关系密切。虽然华人移民内部极其多元化，如华人出身背景不同，有台湾、香港、大陆之分，经济背景和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但是华人却几乎拥有共同的“美国梦”——房子、生意、孩子上常春藤大学。这共同的美国梦成了维系华人社会的一种纽带，使得华人不管出身背景、经济及社会地位如何，都会主动参与建构华人社区联络网，彼此分享信息，包括所居地的和中国国内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华人及华裔是“模范少数族裔”，同时又是“永久的外国人”。<sup>6)</sup>华人社区的建构让华人始终维系着同来源国中国的联系，同时由于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整体上的和平背景，华人享有自由往返于来源国与所居国的权利，可以充分活用两地资源，加上华人作家的作品多数在中国出版，其预设读者多为中国人，讲述华人的故事让其预设读者不会有文化距离感，其中自然会涉及到对来源国中国的回忆。史书美提出“反离散”，认为华人既然移民了，就应该完全断绝同来源国的联系，完全认同所在地的文化，实现完全的在地化。虽然各国华人的境遇不尽相同，但要做到真正被移居国主流社会完全接受与认同，实现完全的在地化，并不是短时期所能够实现的。内在的情感因素加上外在的社会环境，导致华人作家作品中总是脱离不了“中国经验”。

华人作家笔下的中国经验，并不是单纯的中国经验、单纯的中国式写作，给突破中国现当代文学窘境以借鉴及思考。本文关注的是加拿大籍华人作家李彦的中文版《红浮萍》（2010）。李彦

3) 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 세계화문문학, 화인화문문학 —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주장에 대한 중국 대륙 학계의 긍정과 비판>, 《중국어문논총》, 제80집, 중국어문연구회, 2017.04.

4) 毕文秀, <从后移民看华文书写:以北美地区华人学者史书美及华人作家严歌苓、张翎为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 第85号, 2018.04, pp. 79-82.

5) 毕文秀, <陈河的战事叙事小说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 第88号, 2019.01, p. 213.

6) [美]周敏 著, 郭南 译, 《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2006.10.

是一位中英文双语作家，英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sup>7)</sup> (1995) 发表之后，备受加拿大主流关注，获1996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李彦也因此于1996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加拿大主流报刊这样评论这部小说的，“作者用娴熟流畅的笔法，将中国社会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矛盾化繁为简，将中国文化、哲理、传统价值观编织一处，写出了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书中几位女主人公具有鲜明复杂的个性，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sup>8)</sup>从故事性层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就思想精神层面而言，“她展示给读者的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的人性，而是真实生活中常常使人徘徊于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之间，很难找到答案的复杂的道德观。正是这种承认人性的复杂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透彻掌握，才使得她能够以如此丰沛的情感写出这部最为深刻、最令人敬佩的小说。”<sup>9)</sup>

李彦亲自操刀将该书译写为中文版《红浮萍》，于201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然而《红浮萍》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受到极大关注，到2019年3月以《红浮萍》为对象的研究论文不到十篇。与同是中英文双语作家的严歌苓的“热”相比，李彦明显受到的是“冷”待遇。研究者贺绍俊认为严歌苓带给当代文学的是思想碰撞，李彦带给当代文学的是语言碰撞。但由于中国人的思路和兴趣基本上还停留在思想碰撞，并没有意识到语言碰撞的重要性。这就导致了李彦的《红浮萍》在中国大陆的冷待遇。<sup>10)</sup>贺绍俊讲的关于李彦给当代文学带来的语言碰撞，我认为可以从《红浮萍》的思想内容层面加以仔细分析。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因为《红浮萍》无论是诗学层面还是叙事层面都极具特色，就诗学层面来说，易淑琼认为《红浮萍》主要运用古色古香的书卷气质、典雅气质的散文诗般的语言来烘托营构出“古典意味的中国境界”，充分展现了类似于中国古典诗词般的美与意境。<sup>11)</sup>宋阳以《红浮萍》中的叙事时间及内聚焦与外聚焦的叙事技巧为主要分析点，指出作者李彦对“‘红色中国’的那段过往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回顾、观察、剖析、评判，取得了超越单一层面的深度反思”<sup>12)</sup>。多数研究者认为作者李彦以小说为媒介，批判政治事件的荒谬以及其对个体造成的伤害。如，杨全在《悖论下的心灵挣扎——读《红浮萍》》中认为《红浮萍》把悖论下的挣扎和少年的恐惧层层强化，大浪拍岸，响鼓重锤。<sup>13)</sup>刘丽红认为作品通过平的回忆引出了一条颠沛流离的家族之路，温婉地道出了特使历史境域中个人命运的失控状态，同时折射出沉重历史下暗涌的人性温情和动乱年代理性缺席下爱成为一种不可接近的乌托邦。<sup>14)</sup>也有研究者从人性入手对其进行分析，如赵从娜认为《红浮萍》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小说，更是一个透视社会与生命的广角镜，是一部阐释苦难并不失希冀的深沉之作，沧桑岁月、复杂人性贯穿于现实与过往两条并行旋

7) 该书1995年由加拿大多伦多Sister Vision Press出版。

8) Rita Wong, “Red is the Color of Struggle”, KINESIS, February 1996:14, 转引自贺绍俊, 〈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 《文艺研究》, 2011年第2期, p. 17。

9) Eva Tihanyi, “Watch This Space: Books in Canada’s First Novel Award Shortlist”, Books in Canada, March 1996:6. 转引自贺绍俊, 〈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 《文艺研究》, 2011年第2期, p. 17。

10) 贺绍俊, 〈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 《文艺研究》, 2011年第2期, pp. 14-20。

11) 易淑琼, 〈走不出的意境——华裔双语作家李彦《红浮萍》中文译写本的诗性语言书写策略〉, 《名作欣赏》, pp. 86-93。

12) 宋阳, 〈《红浮萍》的叙事特色与反思意识〉, 《华文文学》, 2012.06 (总第113期), pp. 82-89。

13) 杨全, 〈悖论下的心灵挣扎——读《红浮萍》〉,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11.02。

14) 刘丽红, 〈荒谬背后的温暖与虚空——评长篇小说《红浮萍》〉, 《名作欣赏》, pp. 81-85。

绕的线索中重新诠释着生命，苦难在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满目疮痍的往昔，却又是生命的底色，是开出坚强勇敢的心灵之花的沃土。<sup>15)</sup>李彦身兼学者与作家，同时又是孔子学院的院长在西方普及中国文化，具有多重身份，她在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出版十几年之后，亲自将其译写成中文版，其用意不仅仅在于批判过去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本文以李彦的 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中文译写版《红浮萍》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及精神分析、文化分析等方法论，探析小说的思想层面，从对母亲人生悲剧的反思与批判、解构与重建中国形象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探讨李彦作为一个生活在北美多年的知识分子，她如何反思故国历史，对西方文化又有着怎样的思考，李彦的这种看与反看式的双重反思，充满了批判、解构与重建意识，试分析其对华人写作的意义。

## 2. 对父母人生悲剧的反思与批判

《红浮萍》是一部自叙性小说，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李彦采用内聚焦和无聚焦叙述并行的叙述技巧，通过叙述者“平”来讲述一家三代人的故事，整部小说充满了反思意识。“我出国时已经三十出头了，不是小孩子。但在中国时，尽管生活中充满了颠沛流离、生离死别，但从来不会思考为什么，因为谁都是这么过日子的，谁也没有觉得不正常，人生都是如此罢了。但到了国外以后，因为环境的突变，我才觉得，原来的生活可能是不正常的，我才开始反思，我们得到了什么，或是我们失去了什么。”<sup>16)</sup>按照新历史主义的看法，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写作者的主体意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华人文学中，涉及到对中国现当代史的描述，大多数作家采取的是批判政治的态度，特别是涉及到“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段创伤记忆。

《红浮萍》中可以看到作者李彦对过往历史的态度，反思胜过批判。《红浮萍》从叙述者平在加拿大接到母亲雯的电话，得知自己的生父楠去世的消息展开叙述，母亲对楠的去世似乎没有表示出多大的悲伤，甚至在楠去世以后，母亲雯依然坚持认为楠是自己一切厄运的根源。叙述者平对此表示质疑，“我开始疑惑：给妈妈带来厄运的，果真是楠吗？如她一贯所坚信的那样，把我们几十年来历尽的劫难都推到他的头上，公平吗？显然不。可如果不怨他，又怨谁呢？命运？时代？还是我们自己？”<sup>17)</sup>由此展开了对父母一代人尤其是母亲一生的思考。

母亲“雯”出生于富甲一方的财主之家，她父亲杨大善人年近六十时娶了其母作为续弦，原因是杨大善人栖下无子，只有四个女儿，续弦是为了能够得到子嗣。平的外婆生下了一男二女。在雯五六岁的时候，她哥哥棠曾领着她和姐姐一起偷偷溜出深宅，来到渡口，乘船过江去城中庙会看热闹。可是哥哥棠却故意把两个妹妹丢下，自己一人转身跑掉了。

15) 赵丛娜，〈用苦难还原生命的底色——读李彦的《红浮萍》〉，《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3期，pp. 22-25。

16) 王红旗、李彦，〈新移民文学女性经验的独特诠释——旅加中英文双语作家李彦访谈（中）〉，《名作欣赏 Female她视界》，p. 119。

17) 李彦，《红浮萍》，作家出版社，2010，p. 4。以下凡引自该小说中的内容，将不另作注释，只标出页码。

兴冲冲地回到家，荣得意洋洋地对大人宣布：“好啦，我已经替你们把那两个没用的东西扔掉了！”

外婆愕然。日渐衰老的外公，茶余饭后没少抱怨，生养女儿如何徒劳无益，因为每嫁出一个女儿，他都要陪送上一份丰厚的妆奁。没想到，小小年龄的荣，竟会把外公的唠叨放在心上，自作聪明，导演出这样一幕险剧。（19页）

当时荣才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平日里受父权主义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反衬出雯自小生活的父权氛围。雯生于民国后，年仅五岁就被开明的母亲送入新式学校入学读书，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从她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她的女性独立自主意识慢慢觉醒，继而是对父权的不屑与反抗。“当雯的一些女友相继嫁与地方官吏、部队军官、洋人买办，甚至给政府要员做小妾时，她便一一与她们生分疏远了。在那个年代，十五六岁的女孩嫁个有钱有势的丈夫，是很多女学生的出路。雯却不屑于随这种大流。‘我上学受教育，是为了有能力凭自己的本事打天下，岂会为了找个饭碗去嫁给什么俗不可耐的男人！’”（31页）在雯生活的世界里，两性从来就不是平等的，旧家族对女性的种种歧视，她从小就已体验过，甚至在她父亲咽气的那一刻还在遗憾她不是男儿。正因为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她就接受了那个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妙蓝图，萌生出投入到滚滚洪流中献身的冲动。”（45页）土改时，雯尽管意识到这将剥夺她生来就有的锦衣玉食的生活权利，但她依然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给她母亲写信，让她母亲主动交出巨额家产，做一名开明地主，她母亲也因此而免遭厄运。抗美援朝时，她在即将大学毕业之际毅然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是屈指可数的几名女生之一，并给自己立下了目标“半年入团，一年升排级，两年入党，三年升连级。”（56页）通过努力，“在军报做记者的数年间，她季季获奖，年年立功，一步步逼近着她理想的高峰。”（57页）共产党完全唤醒了“雯”潜意识中的女性独立自主意识，她觉得凭自己的努力可以闯出一番天地来。

两性平等意识给雯的人生带来了希望，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她婚姻生活不幸的根源。雯努力追求自己的社会地位，她同丈夫虞诚结婚后依然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婚后两人的生活同他们谈恋爱时完全不同。婚前两人周末约会去看电影，虞诚有苏联留学的经历，他们会一起看原版俄语电影，虞诚会向雯解说电影中的细节。可是结婚以后，情况完全变了。雯不仅要上班，回家还要做家务，侍奉婆婆，照顾孩子，节假日安排家人出游。她丈夫虞诚下班后，从不帮助雯做家务，只是自己埋头看书。“星期日，虞诚是从来不在家中多耽搁一刻钟的，放下碗筷，他就会匆匆出门，乘车去中苏友好协会，在那里看上一场原版俄语电影，然后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最新的技术资料。雯留在家中，打扫房间，还要洗涤衣物。”（93页）对此雯也曾抱怨过，“难道虞诚从没想过，我是一个知识女性，同样需要利用周末和假期的时间，进修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吗？”（94页）尽管雯具有两性平等意识，希望丈夫能够帮助自己分担家务，可是并没有得到丈夫虞诚的帮助。可能因为雯此时已经被打成“右派”，虞诚一直面对组织上要求他同雯划清界限的压力，这让他有意回避雯。可是小说叙述中雯在两人认识不久后，曾悄悄找到虞诚在莫斯科大学时的同窗，打探虞诚的为人。和虞诚住在同一宿舍里的四名中国人中，虞诚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打扫过公共卫生的人。同学说“他想抓紧每分每秒读书，但别人也需要时间哪！可能，他从小到大，没有干过任何家务事，已经习惯了吧！当然，除此之外，他倒是没有其他问题。”（95页）这说明哪怕没有雯的政治身份问题，他也是不会帮助做家务的。

《红浮萍》中雯的两性平等意识同女性附属于男性的传统价值观是冲突的，同时与婆媳间对女性的定位也是不相容的。小说中以儿童视角展现婆媳间的矛盾。奶奶没有接受过教育，更不懂政治，她不知道雯被划成“右派”意味着什么，把“右派”理解为“油派”，“在奶奶眼中，除了‘油派’这个不光彩的头衔之外，妈妈还是一个不会持家过日子的好儿媳。她不会烹饪，不会动剪子拈针线，还爱花钱”。（106页）而“在妈妈眼里，有知识且有高尚职业的女性，才是女人中的佼佼者。而只会料理家务的女性，与只会下蛋的母鸡没有两样。”（107页）雯的两性平等意识使得她与婆母眼中的好儿媳标准截然相反，以致于婆媳间的矛盾日渐剧烈。雯的女性平等意识中又内涵着强烈的精英主义意识，这使得她一方面追求女性平等，另一方面又打心眼里瞧不起家庭妇女。雯努力地想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找到平衡，实际上她既没有得到婆婆的理解与尊重，也没有得到丈夫的关爱与支持，这导致了她在情感上的孤独。

雯努力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因为性格桀骜不驯且又依仗自己的履历不凡（是转业军人、先进工作者，还是团支部委员）。“反右”运动中，她在看报纸时，因为不满于报纸上刊载的文章，随口说了一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83页）雯因此而被打成了右派。雯因为这一句话而被打成右派是很荒谬的，她却依然甘愿为入党而忍受任何苦难，甚至奉献自己的一生。刘再复认为雯早年丧父，她把“组织”看成了伟大的、终身崇拜的父亲，因此“加入组织”化作她终身的魔幻似的“情结”。这个情结压倒一切，包括爱情、亲情、友情。

从精神分析学来看，雯之所以如此，应该同她少女时代的经历有很大关系。雯少女时代曾经与其英语老师相爱，这位年轻教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后来这位年轻老师赴英伦留学，学习神学，他们分手之前，说好让雯等他。可雯苦苦等待的结果却是年轻教授决定采取独身主义，将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伟大的主。年轻教师是雯尊敬且爱慕的对象，他的这一举动对少女雯影响深刻。拉康认为幼儿在镜前的欢欣雀跃喜不自禁的表现是幼儿心理形成的一个重要步骤，镜中的映像助成了幼儿心理中的“自我”的形成。从镜子阶段开始，人始终是在追寻某种性状某个形象而将它们视为自己的自我。<sup>18)</sup>雯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这位教师，可谓爱得刻骨铭心，她在无意识中开始把她的爱人当成自己的楷模。如果说年轻教师把自己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了伟大的主，雯则要把身心都献给共产党组织。当她的丈夫楠被诬蔑为“胡风分子”、“国民党特务”时，当时已经身怀六甲的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党组织。她在狱中质问楠为什么要欺骗组织，欺骗她时，楠为自己辩解，说他是清白的。雯毫不犹豫且振振有词地质问道“你要我相信你的清白？可是，组织上的决定，难道能是错的吗？”（58页）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同楠划清界限，断绝关系。正是因为对组织的绝对信任，雯没有怨恨过时代，没有怨恨过政治，没有怨恨过共产党，更没有怨恨过将自己推入政治漩涡中身边虚伪的人，却将自己厄运的一生都归于与楠的结婚，甚至楠本人，楠成了一切厄运的根源。而从叙述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母亲的人生悲剧正如开篇叙述者所说的那样，不仅有时代的原因，政治上的原因，还包括当事者个人性格及思维上的原因。

作者李彦在反思了父母人生悲剧的基础上，对当时荒谬的政治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文化大革命划上句号时，雯、楠、虞诚等一切曾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都得到平反，楠也终于见到了自己从未谋面的女儿时。他说“几年前，党组织重新审查了那起牵涉到我的冤案。多年前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的我的老师，终于被证明是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熬过了枪林弹雨岁月的

18) 拉康 著，褚孝泉 译，《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pp. 9-12。

英雄，谁能相信，却冤死在自己人的手下！为了某些人犯下的不可饶恕的过错，我失去了珍视的一切，我的青春，我的爱，我的家庭！”（298页）可见当时政治的荒谬。尽管楠得到平反，但是雯依然不愿见他，当平告诉父亲楠如果他申请入党，她母亲雯可能就会同意见他时，楠摇摇头，仰天长叹“几十年来，我九死一生，侥幸活命，却失去了我最珍视的人间亲情。荣誉地位，我早已视若粪土，何况一个虚假的名声！”（304页）经历过太苦太难九死一生的楠，在往事成为追忆时，看透尘世一切名利，从个人立场表达了政治运动给他带来的苦难以及他的人生感悟。当母亲最终宣誓入党，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荣誉时，她却极其落寞。“今天在公共汽车上，大家都伸出手扶着头顶栏杆。那么多只手，每一只都比我的光滑、年轻。对比之下，我才发现，我的手，不知何时已经布满斑点，失去弹性，长满了皱纹。”（300页）曾经为入党这一信仰而付出的执着与努力，在母亲雯看来，得到的并不足以甚至并不能够弥补她所因此而失去的。虞诚反思道“爸爸妈妈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的确是看不惯当时政府的腐败，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换来国家的民主和强盛。是的，我们牺牲了很多，甚至是无谓的牺牲。我们虽然老了，却初衷未改。今天的我们，仍然希望看到人民在历经劫难之后，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孜孜以求的，仍然是一个民主富强、繁荣昌盛的中国。”（303页）虞诚的反思充满了包容。

楠、雯和虞诚这三位知识分子对过往政治事件的态度，可以说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声音。“三”，其实是意味着“多”。作者李彦通过这样一种叙述将历史分为多个层面，从而摆脱了一分为二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跳出了对历史是非判断的怪圈。李彦如此反思“我父母那辈人，大学时代便加入了中国革命的队伍，为了中国的未来献身奋斗。他们不是没有知识的文盲，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在剖析这种根源。我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也是美好的，跟基督教的教义一样，都是美好的信念；但在实践这些理想的过程中，是人，把这些都给糟蹋了。所以，我父母那代人纯洁、热情地投入到要改造社会、改造人类命运、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运动中，最后却都成了牺牲品。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出于外部环境，又有多少属于人性使然？我想剖析的，就是这个过程。”<sup>19)</sup>因此，「红浮萍」中作者李彦尽管讲述的是苦难，但并没有简单的控诉与怨恨，而是以一种宽容的、理解的姿态反思那段不堪的历史对人物性格的形成及其命运带来的影响。

### 3. 解构与重建中国形象

萨义德曾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强调，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与东方并无关系，而且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东方这么一回事，东方只能是一种话语建构，内涵西方中心主义。尽管萨义德所谓的“东方”并不包含中国，主要是指伊斯兰，但从萨义德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并非真正的中国，而是一种对中国的想象，这一想象建立在各种道听途说（包括各种媒介）以及种种文学作品文本叙述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是被建构和想象出来的，而这一建构和想象出来的中国形象（包括中国人）多是负面的、消极的。比如《红浮萍》中加拿大富

19) 王红旗、李彦，〈新移民文学女性经验的独特诠释——旅加中英文双语作家李彦访谈（中）〉，《名作欣赏 Female她视界》，p. 120。



孀老太太就觉得她的狗“麦克可不是普通动物！它跟人没什么两样！不，它比人还强呢！哪像你们中国人，树皮、草根、老鼠肉，什么都能往嘴里填……”（140页）其种族优越感不言而喻。华人进入加拿大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早期华工为建设加拿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华人作家张翎的《金山》讲述的就是加拿大早期华工的故事。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历史上都发生过排斥中国华工的《排华法案》。1971年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宣布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多元文化政策承认各民族的专属文化，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并最终形成多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社会形态。<sup>20)</sup>从表面上看多元文化政策改善了加拿大华人以及其他族裔群体的社会地位，但是加拿大主流社会白人如小说中的富孀依然对中国人充满了歧视。面对这一情况，小说叙述者理直气壮地问“‘你说谁呢？’这回轮到我拉下脸了，还两手叉腰，‘你见过哪个中国人吃老鼠肉了？’”（140页）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提出“反凝视”反抗法，提出将种族批判付诸于行为。凝视是大人惩罚小孩，白人奴隶主惩罚黑人奴隶的方式，大人或奴隶主这时候会说：“对你说话的时候看着我。”贝尔·胡克斯发现“凝视”的同样可以作为反抗的空间，白人可以看过来，黑人同样可以看过去，即反凝视。从而释放自己的愤怒，发出自己的声音，挑战权威。<sup>21)</sup>如果借用这一“反凝视”理论，我们会发现，作者李彦在用这种类似于“反凝视”的批判方法，利用反问来对抗加拿大富孀的歧视心理。面对叙述者的逼问，“老太太自知理屈，触犯了‘种族歧视罪’之法，便低声咕哝了一句‘对不起’，目光躲着我，牵着麦克躲进屋去了。”（140页）李彦以“反问”来发声，对抗、批判主流社会的白人中心主义与种族优越感。李彦在谈到 *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的创作初衷时，“我发现，外国人用英文撰写的各类中国题材，包括历史事件、政治运动等等的书籍，在他们的图书馆和书店里也不少见，只是某些书中的内容，缺乏客观和公正，误导了西方读者。我觉得，作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局内人，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更加客观公正、更加细腻准确地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于是我决定创作英文小说「红浮萍」，直接向西方英文读者介绍20世纪真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通过一个家族三代人在百年历史中命运的变迁，忠实地再现在历史大潮的裹挟下人们难以自主的漂浮，真切地描述历经沧桑的人们的坚韧与追寻。”<sup>22)</sup>

李彦并不满足于仅仅以“反问”、“反凝视”方式来对抗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争取话语权，她还要解构西方对中国的想象，重建中国及中国人形象。因此小说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及中国人故事的正面描写。比如，在加拿大富孀歧视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毫无尊严连老鼠都吃，作者李彦通过叙述者平的回忆主要用第一人称“我”从儿童视角叙述了静山叔一家人的生活。静山叔是工人阶级，静山叔性格坚韧，吃苦耐劳，除了上班以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在大山里开了二亩荒地种粮。因为静山叔一人的工资不足以养活一家七口人，叙述者“我”和弟弟又迫于政治原因而不得已被妈妈寄养到静山叔家，这无疑更加重了静山叔的负担，尽管叙述者的母亲会月月寄抚养费给静山叔，但是生活依然艰辛。“虽然家中经济状况如此窘迫，但静山叔治家仍是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孩子们无论怎样饥饿，也都学会了默默地忍受。”（171页）可见静山叔家教之严。然而在某个春

20) 李桂山、马京京、丁颖，〈加拿大华人社会历史变迁及其身份认同〉，《经营与管理》，2014年第12期，p. 140。

21) 赵稀方，《历史与理论：赵稀方选集》，花城出版社，2014，pp. 230-232。

22) 江少川、李彦，〈用中文写作，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李彦访谈录〉，《华文文学》，2013.03（总第116期），p. 122。

日家里完全断了粮，三岁的幼女和七岁的幼子，在一家街头小饭铺里，舔吃别人剩下的残羹剩饭，这让静山叔在人前的尊严和脸面尽扫。当晚静山叔拿着皮带狠狠地教训了两个孩子一顿，“今天打你们，就是要叫你们记住，做人不能下贱！咱老田家，人穷志不短！”（171页）叙述者讲道“不知道两个孩子究竟是否真正明白静山叔的训斥，只见他们扭动着身躯，躲避着皮带的威胁，流着眼泪，结结巴巴地重复着那些誓言。”（171页）对于年幼无知的孩子来说，没有比饿肚子更可怕的事，尊严体面他们怎么会懂得呢？而静山叔在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中毅然选择了有尊严地活着。

除此之外，李彦在《红浮萍》中努力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如砍树。“这里漫山遍野生长着杂树，是政府为当地居民划定的可以合法砍伐烧柴的区域。”（158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许以任何理由砍伐树木森林都有破坏生态环境之嫌，可是在当时尚不发达的中国，哪怕是今天，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普及液化气，更没有电器类，只能靠烧柴禾生火做饭、取暖。柴禾是农村人生活的必需品，“政府为当地居民划定的可以合法砍伐烧柴的区域”体现了政府体恤民情。“出山的路口，有护林员把守，若发现了禁止砍伐的硬木树种，如黄玻璃、水曲柳等，便从爬犁上抽出，扣下，也不罚款，放人走路。”（158页）违章罚款也许是法制社会的特色，而中国社会似乎在法制之外，还讲人情。因此，哪怕发现有人违规砍树，也只是扣下树木而已，并不罚款、扣人。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十年浩劫，提起文化大革命，多数作家持控诉态度。李彦在《红浮萍》中解构了这一思维，重建读者对文化大革命想象。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干部下放到贫困地区，同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这让贫苦大众有机会同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接触。如叙述者“我”一家随着爸爸研究所来到坐落在河南省中部，黄河故道旁的一片遍生芦苇的盐碱滩，映入眼底的只是满目苍凉。当他们终于到了一座村庄——坡柳。叙述者“我”一来到这里，就被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子围住了。她们又说又笑，兴奋地大声议论着。

“瞧，她身上的洋布衫多好看！过年我也要做一件，把扣子钉在胸前！”

“她那京腔儿，多好听！”

“看她那牙，才白哩！”

“人家那牙，见天要刷几遍哩，你也学学嘛！”

这些女孩子，不论五官美丑，都令人遗憾地长着一口黑黄的牙齿，后来听说，由于饮水中含氟量过高所致。她们身上穿的衣服，颜色晦暗，面料粗糙，都是家织土布裁制的，又短又小，紧紧裹着她们相对健壮的躯体。衣服的式样，竟然是电影中看到的解放前流行的大襟衫。如今在大城市里，那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的装扮。（p. 212）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大城市在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下放，恐怕这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不会知道原来衣服可以有这样的式样，原来人的牙齿可以是白色的，北京话原来是这样的。可以说叙述者我的到来给这些生活在乡村与世隔绝的姑娘们一种憧憬，尽管在那个时代她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至少给了她们一种对世界的另一种想象。

除此以外，生活在贫苦山区的村民还能体验文艺生活。比如，叙述者我随妈妈到长城外的杏树岭生活。杏树岭名字起得很有诗意，却并没有杏树，充满着与世隔绝的荒凉。当叙述者“我”接受同妈妈一起下放的老干部的建议，答应为村民举办一次文艺表演，庆祝秋收胜利结束。演出内容

比较简单,“为小孩子们准备了几首合唱歌曲,又和几个大姑娘排练了两个舞蹈,一个是《唱得幸福落满坡》,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是《我编斗笠送红军》,不忘革命老传统。”(pp. 237-238)可是这场文艺表演在当地竟反响极大。本来只为杏树岭十几户村民而办的,没想到这么简单的表演,在演出当晚,在这乡间竟成了罕见的盛事,招得深山里人家翻山越岭举着火把赶来观看,演出结束,观众散尽之后,参加演出的几个姑娘仍意犹未尽,不想离开,不厌其烦地回味刚才表演时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笑个没玩,穷得从未想过要照相的她们,因为叙述者一句话而想到要到镇上的照相馆来张合影。一个多月后,她们拿着一个月攒下来的十几个鸡蛋和半篮子沙果走了十几里路,去镇上换了钱照相。她们穿上了平时下地干活舍不得穿的好衣服,黑灯芯绒衣裤、白线袜、青布鞋,还按照舞蹈中的扮相,在颈上系了条雪白的毛巾,脑后背了顶麦秸编的新草帽。拍照时,大家屏住呼吸,手捧红宝书,有蹲有站,伸胳膊拉腿,按照事先早已商量好的,摆出在台上亮相的舞姿来。镁光灯闪过,大家才松了口气,齐齐笑出声来。临走时还叮嘱摄影师,要在照片上方题一句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广阔天地炼红心。尽管这在今天看来显得幼稚可笑,甚至不乏被洗脑的批评,但是对当时那个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山村里的村民来说,这可能是她们人生中最难忘的也是最值得记忆的一段美好的时光。

张若西在访谈李彦时,李彦谈及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时说,“文革当然有很多问题和错误,但对任何事物都应当进行具体的、量化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养成一事一议的习惯,而非笼统地下结论。客观真实地呈现历史,是有良心的作家应该追求的目标。文革长达10年,这10年中都发生过什么事呢?例如,前三年,遭到所有人深恶痛绝的打砸抢,破所谓的‘四旧’,杀人放火、胡作非为,那是绝对错误的。然而在中后期所采取的不少改造社会的举措和尝试,例如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上山下乡,改造农村的落后现象,医疗专家到农村和边疆培训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老百姓提供服务,的确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有益尝试。”<sup>23)</sup>作者李彦不仅解构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同时又解构了中国人对文革的创伤记忆,在双重解构中重建了中国形象。

## 4. 结语

随着科技的高度发达,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从未走得如此之近,曾居住在各文明体系中的人们必将因为全球化移民潮而走得更近。在文化接触过程中,移民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各不相同。就加拿大华人来说,有研究者将其“分为抑郁和不安、被压迫和压力、自我存在感下降等类型。”<sup>24)</sup>就北美华人移民心理来说,这种分类还是比较能够体现华人移民心理的。除此以外,李彦在《红浮萍》中还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平等对话心理。《红浮萍》出版后的第二年,1996年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驻北京记者、土生华裔黄明珍(Jan Wong)出版了文革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在北美极为畅销,引起了轰动。对此,李彦表示“我是以‘insider’(局内人)的身份来讲述中国的故事的,而黄明珍的描述,处处体现了一位‘outsider’(局外人)的观

23) [加拿大]张若西,〈李彦访谈札记〉,《华文文学》,2018.05(总第148期),p. 56。

24) 고희림, 양난, 〈문화접촉의 경험이 문학작품을 통해 구현하는 작중인물의 심리학적 접근과 고찰〉, 《중국학》, 제63집, pp. 39-55。

察和感受。一个insider的注意力是内倾式的，她来自于那里，生活和成长于那里，便自然会更多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挖掘人性中更具深度的东西，更多关注精神层面那些真切的体验，而一个outsider则较多关注表层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有时难免给人以走马观花、猎奇甚至误解之感。中国人写中国和外国人写中国，出发点和感受当然不同。”<sup>25)</sup>李彦虽然没有明讲，但其言下之意有些责备华裔的这种自我东方主义做法。

李彦作为一名生活在西方多年的知识分子，她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人生三境界来总结自己在西方国家生活和认识的三个阶段：“我们初到北美的时候，记忆犹新的，就是母国发生的一切，‘昨夜西风凋碧树’，刚刚过去的‘文革’使得万木凋零，隐含了一种谴责；‘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当时的心情：只身一人来到西方社会，回望故国、反思历史，所以我们最开始的英文小说都是关于祖国的。二十多年后，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融入主流社会多年。对我来说，逐步产生出一种‘他不再是他，我不再是我’的感觉。对其他文化了解得越多，你就越清楚：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论种族、语言、信仰、制度是多么的不同，但人类的内心世界，真善美的标准都是相通相似的，剥去表层之后，并无本质上的区别。”<sup>26)</sup>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得李彦笔下的主人公具有一种强烈的平等意识。「红浮萍」解构了西方文化优越的神话，尤其是对民主与自由有着深刻的思考。比如小说中提到在三伏盛夏，加拿大清洁工为了争得更加优惠的待遇和薪酬而罢工，几个星期下来，城里的大街小巷已是臭气熏天，成了老鼠和獾类肆虐的乐园，市民因此而叫苦连天却没有解决办法。叙述者如此道“‘一小部分是享受了自由，可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该如何保障？’我插言道。‘渥太华的议员们天天在那儿扯皮，却连这种小事都解决不了！这要是在中国，一声令下，都得乖乖地回去上工。’”（65）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这种专制制度一直被以西方民主选举制为模式的国家所诟病，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没有人权。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崛起”说盛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著《中国三部曲》（2011）（《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通过自己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认为欧美倡导的“民主”型政治即多党制加一人一票选举制并不是唯一的政治模式，他指出西方式政治制度弊端，提出“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文明型”国家，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政治制度应是良政与劣政之分，而不应以民主与专制来分。张维为认为中国政府为改善民生而努力，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但是政府正在努力完善自身。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中国政府注重改善民生，政治上没有采用西方方式的民主制，只是从经济上导入了市场经济，中国因此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取得了飞跃发展。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采用西方的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操作起来，恐怕难度很大，更何况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并不均衡，虽然有些地域已经进入发达地区水平，但是很多地区依然把脱贫致富作为首要目标。试想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经济保障都没有，如何能够保障选举的公正。西方的自由与民主同西方文化自身的发展关系密切，换句话说，自由与民主是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同西方内部关系密切。如果无条件照搬西方各种制度，非但无法发展本国经济，还有可能让国家陷

25) [加拿大]赵庆庆，〈风起于《红浮萍》——访加拿大双语作家、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01，p. 76。

26) 蔡晓惠、李彦，〈中英文双语创作与中华文化传播——与加拿大华裔双语作家李彦的对话〉，《南方文坛》，2017.03，pp. 51-52。

入崩溃，如前苏联解体，泰国经济下滑等等都可看成前车之鉴。<sup>27)</sup>李彦生活在加拿大多年，她多少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也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缺点。中国政府一直标榜追求大多数人的利益，通过叙述者的议论，可以看出作者并不完全认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从文化政治对等的立场来实现平等对话。

李彦的这种平等对话不仅发生在中西方文化之间，还发生在中国内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一直以一种仰视姿态看待西方社会，面对自己国家的民众，他们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启蒙意识和文化身份优越感，在他们眼中，中国广大劳苦大众是麻木不仁的，被一种奴性意识支配，正因如此，他们才过着不平等的悲惨的生活，所以需要知识分子的启蒙。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同贫苦大众一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阶层，知识分子从来不曾真正走进一般贫苦大众的生活，文化大革命是个例外。文化大革命时倡导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深入到劳苦大众中去。李彦作为一个有着亲身体验的人，她才能更深地理解中国劳苦大众。李彦曾谈到自己听到过很多人抱怨文革那段经历对自己宝贵青春的“浪费”。她认为，“如果那些参与了上山下乡的人认为命运于自己不公，他们有没有想过那些出生在山里乡下的孩子们，难道他们就命该如此吗？”<sup>28)</sup>小说《红浮萍》中讲述了有一次寒冬静山叔带着几个孩子去深山里拉木头的故事。静山叔带着几个孩子，要把木头从深山里拉出来，经过冰封的河床翻越陡峭的堤坝，才能把木头拉到目的地。静山叔最后实在拉不动了，就攀上爬犁，仰面朝天躺在树垛上，望着满天星斗，长长地叹气，叫着叙述者的小名，“你说，人活一辈子，有多大意思呢？一年又一年，就这样挨着，受着，直到老了，死了，才是个头。在叔叔家里，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你和你弟弟，还有个盼头。早晚有一天，你们还能回到北京，回到你爸妈身边，就不用再受这种苦了。可其他孩子们呢？他们没指望啊，这辈子，怕是跟我一样，摆不脱这种命了……”（159页）面对静山叔对生活的绝望，“我惊讶地发现，在他木讷呆滞的外表下，竟然有着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平时，他不过是在用简单和粗暴，无奈地掩饰着内心的脆弱和对生活的绝望罢了。”在作者李彦看来，农民并不是天生就是麻木不仁的，而是生活的艰辛让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也不可能去仔细关注自己内在情感。“大自然如此的美丽，可当你在充满艰辛的生活中挣扎时，你对它的美是麻木的。这种麻木和视而不见，只有亲身从冰封的河床翻越陡峭的堤坝，竭尽生命之力，将满载着树木的沉重爬犁拽上高高的坝顶时，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它。”（159页）

正是因为李彦对贫苦大众的理解，她笔下的知识分子如爸爸身上没有启蒙姿态和身份优越感。“村中老乡对我们十分友善。白天，爸爸去几里外的河滩上搬石头、打土坯、和泥、烧砖。天黑后，他回到家里，老乡们就经常来串门。大家围着炉子，与爸爸天南海北地闲聊。他们根本不在乎爸爸是什么身份背景，也不屑于搞清楚什么叫做‘解放干部’。他们只是觉得爸爸和蔼可亲，一点儿没有架子。每个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心事说与爸爸，让爸爸分析指教，包括村民之间多年来存在的恩恩怨怨。爸爸似乎很高兴老乡们对他的信任，总是不厌其烦地开导每一个人，帮大家化解矛盾，言归于好。没过几天，爸爸就让老乡拿把剃头刀，剃掉了他留了几十年的分头，从此和老乡们一样，晃动着光秃秃的脑勺”（第214页）这里没有一般文革小说中描述的残暴，也没有为知识分子抱不平的愤慨。采用儿童叙述视角，以平白直叙的叙述风格表现了爸爸身上没有知识分子的精英

27) 张维为，《中国三部曲·中国震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8) [加拿大]张若西，〈李彦访谈札记〉，《华文文学》，2018.05（总第148期），p. 56。

意识与身份优越感，真心实意地同当地村民交流、交朋友。而当地村民也很喜欢爸爸，希望爸爸帮助他们，由此解构了启蒙与被启蒙二元对立，实现了平等交流对话。

李彦作为生活在加拿大的少数族裔中的一员，她用加拿大官方语言英语创作的讲述中国故事的小说 *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1995) 属于德勒兹和加塔利定义的少数文学。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李彦的加拿大籍身份使得她的中文译写本《红浮萍》又属于华人华文文学。如果说英文版本是为了同西方读者进行沟通，为自己的母体文化争得一席之地，中文译写本预设读者应是中国人或者华人及可以用汉语进行阅读的读者，其预设目的则不同。李彦在「红浮萍」后记中如此说道，“来北美二十多年了。不知为什么，我发觉，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人与长期生活在国内的人，在看待东方、西方、历史、现状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少差异。多年的置身其中，加上为写作之需而自然形成的许多观察和思考，自觉对西方社会多了些了解，对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也看得越来越清。另一方面，对发生在故国的一些旧事，不仅更多了些宽容，对现今的一些问题和举措也增加了理解和体谅，似乎比国内的人们还更期盼祖国能尽快强盛起来。”（321页）李彦的「红浮萍」以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向中西方读者充分表现了文本与历史及社会间的关系。在双重反思视域下，李彦不仅解构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想象，重建中国形象，也解构了中国读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价值判断，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宽容的情怀来看待故国历史，这大概可以看成是华人华文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借鉴。

## 【参考文献】

- 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文艺研究》，第2期，中国艺术研究院，2011。
- 王德威，〈华夷之变：华语语系研究的新视界〉，《中国现代文学》，第34期，2018.12。
- 金惠俊，〈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界限的解体及再划定〉，《中国现代文学》，第80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7.02。
- \_\_\_\_，〈华人华文文学研究试论〉，《中国语文论丛》，第50集，中国语文研究会，2011.02。
- \_\_\_\_，〈华语语系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华人华文文学——中国大陆学界对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主张的肯定与批判〉，《中国语文论丛》，第80集，中国语文研究会，2017.02。
- 毕文秀，〈从后移民看华文书写：以北美地区华人学者史书美及华人作家严歌苓、张翎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第85号，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8.04。
- \_\_\_\_，〈陈河战争叙事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第88号，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9.01。
- 李桂山、马京京、丁颖，〈加拿大华人社会历史变迁及其身份认同〉，《经营与管理》，2014年第12期。
- 易淑琼，〈走不出的意境——华裔双语作家李彦《红浮萍》中文译写本的诗性语言书写策略〉，《名作欣赏》，第36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
- 宋阳，〈《红浮萍》的叙事特色与反思意识〉，《华文文学》，总第113期，汕头大学，2012.06。
- 王红旗、李彦，〈新移民文学女性经验的独特诠释——旅加中英文双语作家李彦访谈（中）〉，《名作欣赏》，第5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
- 江少川、李彦，〈用中文写作，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李彦访谈录〉，《华文文学》，总第116期，汕头大学，2013.03。

- [加拿大]张若西,〈李彦访谈札记〉,《华文文学》,总第148期,汕头大学,2018.05。
- 杨全,〈悖论下的心灵挣扎——读《红浮萍》〉,《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2。
- 刘丽红,〈荒谬背后的温暖与虚空——评长篇小说《红浮萍》〉,《名作欣赏》,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赵丛娜,〈用苦难还原生命的底色——读李彦的《红浮萍》〉,《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第29卷第3期,2011。
- 李镜,〈苦难的歌者——解读加华小说《红浮萍》的女性主体性表现〉,《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27卷第1期,2012。
- 고혜림、양난,〈문화접촉의 경험이 문학작품을 통해 구현하는 작중인물의 심리학적 접근과 고찰〉,《중국학》,제63집,대한중국학회,2018.06。
- 蔡晓惠、李彦,〈中英文双语创作与中华文化传播——与加拿大华裔双语作家李彦的对话〉,《南方文坛》,2017.03。
- 李彦,《红浮萍》,作家出版社,2010。
- 李彦,《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5。
- [美]周敏 著,郭南 译,《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6。
- 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
- 赵稀方,《历史与理论:赵稀方选集》,花城出版社,2014。
- 史书美 著,杨华庆 译,蔡建鑫 校,《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联经,2017。
- 赵林,《从哲学思辨到文化比较》,人民出版社,2014。
- 张维为,《中国三部曲·中国震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反思意识, 中国想象, 批判意识, 解构西方中心主义, 重建中国形象, 文化认同		
	영문	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Chinese Imagination, Critical Consciousness, D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Centralism,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mage, Cultural Identity		
<div>Criticism,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Double Reflection : Interpreting Chinese Writer Li Yan's "<i>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i>"<div>Pil, Moon-Su</div><p>So fa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naming and categorization of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writers. It has generally been carried out around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Ethnic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i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academic positions of scholars and the different emphasis of the issue. This also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reation of Ethnic Chinese write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writers. When dealing with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revolution, their themes always cannot judge the right and wrong of history,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real life. The writing of suffering is basically centered around these themes. This explains to some extent the dilemma facing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hether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an get rid of this predicament. This study takes Chinese writer Li Yan's Chinese version of "<i>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extual perusal and psychoanalysis, cultural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olog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deological level of the novel and analyzes how Li Yan reflec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s a life. Many years of intellectuals in North America, she has thoughts about Western culture.</p><p>Li Yan's double reflection is full of criticism,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consciousness, and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this consciousness.</p></div>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필문수 / 畢文秀 / Pil, Moon-Su		
	소 속	부산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Em@il	wenxiu79@hanmail.net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9년 08월 20일	심 사 일	2019년 08월 26일
	수 정 일	2019년 09월 09일	게재확정일	2019년 09월 17일